

上海文庙儒学研究丛书

与孔子 对话「第8集」

反思儒学在近代的命运

朱贻庭 / 主編



「新文化运动」批判的儒学、孔子，其指向是什么？儒学的命运是否只系于『纲常名教』？批判了『纲常名教』否定了儒学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是否就意味着儒学生命力的终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是否存在有合理的优秀的东西？儒学的命运历史走向如何？这些都成为我们反思儒学在近代命运所必须回答的问题。

• 上海文庙儒家文化研究丛书 •

与孔子对话(第8集)

反思儒学在近代的命运

朱贻庭 主编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孔子对话. 第8集, 反思儒学在近代的命运 /
朱贻庭主编.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496-1768-5

I. ①与… II. ①朱… III. ①儒家—研究 IV.
①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18843 号

与孔子对话(第8集)

反思儒学在近代的命运

主 编 / 朱贻庭

责任编辑 / 熊 勇

封面装帧 / 张 晋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排 版 /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350 千字

印 张 / 11.125

ISBN 978-7-5496-1768-5

定 价 / 45.00 元

序

今年是《新青年》创刊 100 周年。1915 年 9 月 15 日，一份划时代的刊物《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为《新青年》）在上海出版发行，吹响了近代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号角。“新文化运动”以其尖锐而不妥协的笔触直指以孔子为偶像的维护君主专制主义的儒学，发起了猛烈的批判，将近代以来的文化变革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它推倒了持续 2 000 多年的作为君主专制统治意识形态的儒学的“独尊”地位。但是，对儒学的批判并没有实现适合中国现代化需要的新文化体系的建立。近代以“新文化运动”为代表的文化变革并没有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任务，并未实现儒家文化的现代转型。今天，我们要完成近代文化变革未尽的事业，就必须汲取近代文化变革的经验和教训。这正是我们要反思儒学在近代历史命运的本意所在。

其实，反思儒学在近代的命运并非始于现在，早在 1923 年，梁漱溟在燕京大学所做“孔子真面目将于何求？”的演讲中，就针对“新文化运动”批儒反孔，提出要区别真假孔子，揭橥孔子的“真精神”；认为“新文化运动”批判的“三纲五常”的礼教，并非是孔子的真精神。这本身就是对儒学在近

代命运的反思。以后又产生了以冯友兰、牟中三、唐君毅、钱穆、熊十力、贺麟等为代表的“新儒学”，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也都可以说是反思儒学在近代命运的产物。这就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新文化运动批判的儒学、孔子，其指向是什么？新文化运动所批判的儒学，其真正对象是什么？儒学的命运是否只系于“纲常名教”？批判了“纲常名教”，否定了儒学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是否就意味着儒学生命力的终结？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是否存在有合理的优秀的东西？儒学能否实现创造性的现代转化？儒学命运的历史走向如何？这些都成为我们反思儒学在近代命运所必须回答的问题，从而提升对儒家文化的文化自觉性。

在当前的“国学热”中，如何对待传统的儒家文化，也就是说，如何达到对儒家文化的文化自觉，有必要对儒学在近代的命运进行理性的反思。

毛泽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总结，从方法论的角度总结了儒学在近代的命运。但问题是复杂的。儒学在近代的遭际，主流派(激进主义)批判儒学的封建性，但没能对儒学进行建设性的重构。新儒家(保守主义)不是要保守儒学所提倡的“纲常名教”，而是要“返本开新”，试图对儒学作现代性的转化，欲将儒学在新的时代发扬光大。这反映了儒家文化体系的内在紧张。儒学体系自身的内在紧张，蕴含着儒学的内在否定性。近代的社会变革激发了儒学的内在否定性，推动了儒学的演变和发展。

儒学以反映和维护等级礼制为自己的社会制度背景，因而儒学必然就具有“人的依赖关系”的特点。在伦理关系

上重整体而轻个体,重义务而轻权利,重民本而轻民权,重义而轻利,重贵贱、上下等级之别而轻人际平等,等等,在政治上集中地体现为“三纲”。儒学体系中这种内具矛盾紧张的思想结构,在近代的社会变革中必然成为时代的阻力和保守力量,必然要受到先进文化的批判。也就是说,正是儒学自身内在紧张的思想结构,在社会变革中必然暴露出儒学自身保守、落后的一面,导致了儒学作为意识形态统治地位和正统地位的历史性否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儒学的全盘否定,而是历史的辩证的否定,否定中又有肯定。在否定儒学中轻个体自由、个人权利、人际平等的同时,应该肯定其中重整体、义务、民本、贵和、重义、自觉等合理的因素,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将整体秩序与个人自由、权利与义务、法治与民权、差别与平等、自觉与自愿等统一起来。达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对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过,新文化运动的激进派以近代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其注意力偏重于对儒学的批判,而没有能真正完成对儒学的现代建构,而保守派和新儒家虽试图对儒学进行现代转化,并作出了一些成绩,但也终究未能实现“中华新文化”的建构。

反思儒学在近代的命运,一方面要肯定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批判和对儒学独尊地位的否定,但未能救出其中的合理东西进而发展儒学,这又是它的缺点。所谓“复兴儒学”,绝不是也不可能是实现儒学重新定于一尊。这正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不容否定。而对新儒家,应在肯定他们对儒学实现现代转化中的成绩的同时,要研究其不足。这些都是我们反思儒学在近代命运所要做的工作。

正是儒家文化的内在紧张及其与时代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儒家文化在近代的命运。要理性地分析儒家文化的内在构成,既有其时代的局限性或曰历史的特殊性一面,又有其超时空的普遍性一面。这一超时空的普遍性存在,即我们称之为“古今通理”,如“仁爱”、“重义”、“贵和”、“民本”、“诚信”、“天人合一”等,正是儒家文化民族性的特质所在,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之所在。这种反映民族性的特质,体现了儒家文化生命不息的活力。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继承民族文化的精神命脉,创建适应现代人文精神的“中华新文化”。

2015年11月28日,上海市文庙与上海市伦理学会、上海市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会联合举行的第八次“与孔子对话”学术研讨会,集中研讨了“反思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会后将与会的论文汇编成以“反思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为主题的《与孔子对话》(第8集),以不同的论题、从各个角度对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进行了反思,观点不尽相同,所论也不够全面和深入,但多少反映了上海许多儒学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希望能对当前深入开展儒学研究,推进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有所裨益。

是为序。

本书主编

2015年12月20日

目 录

序	1
---------	---

辑 一

“源原整合”与“古今通理”

——关于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

方法论新探/朱贻庭	3
-----------------	---

历史视野中的孔孟儒学/高兆明	25
----------------------	----

思想启蒙的光荣篇章

——为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一辩/陈卫平	34
--------------------------	----

教育儒学的沉浮与重建/夏乃儒	49
----------------------	----

近现代儒学的基本特征与思想精华/邵龙宝	64
---------------------------	----

辑 二

“心力”论

——阳明心学在近代中国的重振与发展/朱义禄	83
-----------------------------	----

从经学到哲学：董仲舒研究范式的现代扭转

——以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冯友兰《中国哲学史》

为例/余治平	107
--------------	-----

民主视野下的梁漱溟和牟宗三/杨泽波	131
章太炎“粹然成为儒宗”辨	
——兼论 1906 年之后章氏思想底色的	
一贯性/蔡志栋	145
严复儒学观新论/汤颖 蔡志栋	163
启蒙伦理场域中的国民想象	
——兼论陈独秀对儒家伦理的批判与超越/付长珍	187
破旧与立新	
——李大钊的道德革命之路/黄勇	202
“儒学理性主义”精神传统的现代转型	
——胡适、梁漱溟、冯契儒学观合论/施炎平	222
梁漱溟“发现”儒学价值的策略选择/陈雷	235
唐君毅哲学创造的“主体”意识/胡岩	254

辑 三

从民国新儒家的心路历程看儒学复兴的必然性/施忠连	269
儒学在民间	
——当代儒学复兴的困境与出路/胡守钧 张凤池	285
中国道路与大陆儒学复兴/陈赟	304
意识形态、文明根柢与道德基因	
——关于儒学当代命运的思考/陈泽环	323

附 录

《与孔子对话(第 1—8 集)》目录	338
--------------------------	-----



第八届儒学研讨会专家合影

“源原整合”与“古今通理”

——关于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的方法论新探

○朱贻庭

从考察中华文化历史演进、尤其是从总结儒学在近代的历史命运中，本文提出了“源原之辨”和“古今通理”两个概念。其用意所在，就是探索文化生命演进的基本模式和继承、发展传统文化的基本方法。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的生成，都有“源”与“原”两个方面的综合成因，即“源原整合”。作为现实文化之“源”的优秀传统文化所以能与现实之“原”相整合，就在于优秀传统文化中存有“古今通理”，它对于今人来说具有现实的“价值对象性”。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实就是对“古今通理”这种“价值对象性”的价值再创造，使之成为体现时代精神的现代价值。

“文化”是具有“形神统一”内在结构的生命体。她不仅是现存着的，也是历史地延续着的，遂成为传统文化。这就是说，传统文化也是具有“形神统一”的文化生命体。其“形”即体现为语言文字、文化典籍、风俗习惯、器物文物等等文化有形体；其“神”即价值观、民族精神。“形以载神”，“神以君形”。一个民族的民族精神和价值观，正是通过这个民族的文化之“形”而代代相传，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所谓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实质上就是延续这个民族的“精神命

脉”。不然,就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果丢掉了,就割断了精神命脉。”所谓“精神命脉”,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之“神”,一个民族的民族之魂。所以,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本质上就是民族“精神命脉”(文化其“神”)的延续和发展。那么,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和精神命脉是怎样历史地延续的?又是通过怎样的方式实现其历史延续的?这就需要从文化发展史观的角度探讨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的规律。为此,我们又提出了几个概念,即“源原之辨”、“价值对象性”和“古今通理”。

“源原之辨”是一种文化生成的综合成因,也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发展的一般路径;“价值对象性”是存在于优秀传统文化中可以进行现代价值评价的对象,是存在于优秀传统文化中可以转化为现代价值的价值可能性;“古今通理”则是“价值对象性”的具体体现,蕴含着民族的“精神命脉”。所谓继承和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古今通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通过“古今通理”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而延续民族的“精神命脉”。

“源原之辨”:一种文化生成的综合成因

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问题,任何一种社会文化的生成,都有“源”与“原”两个方面的综合成因。“源”即渊源、资源,指历史地形成的承载着民族“精神命脉”即包含着优秀内涵的传统文化(也包括外来的文化影响);“原”即本原、根基,指社会现实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状况及其变革。“源”不仅为一种社会文化建构提供了可资选择的文化资源,而且还规定或影

响这一社会文化建构包括文化话语系统的民族精神特质和民族形式。事实上,传统文化,“它是现在的过去,但它又与任何新事物一样,是现在的一部分”。^① 因此,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的建构和建设,都不可能是超脱传统文化的无历史的,就是说,都必然要以传统文化为其既有基础和前提。例如哲学,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②任何一种新的文化建构,都要以传统文化为其渊源和前提,从而体现了文化演进的继承性,延续其民族的生命和“精神命脉”。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传统文化的演进又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存在(“原”)的作用。“原”不仅决定了一种现实的社会文化的社会性质、价值导向和时代特征,而且决定着传统文化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情形。恩格斯在讲到经济对传统的哲学思想材料发生作用时指出:“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③这就是说,作为“源”的传统文化必然要受到现实之“原”的鉴别和取舍。因此,“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魏源语),今人正是通过据于今之“原”而对古之“源”的鉴别和取舍,去改造和发展传统文化。这里的关键是要在传统文化中发现为现实社会所需要的并可转化为现实价值的价值对象,即发现传统文化中所含的现实的“价值对象性”(下详)。当然,传统文化的这种“价值对象性”,不就是直接拿来可用的

① 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② 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9页。

③ 见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0页。

“现实价值”；传统文化的“现实价值”不是被“发现”的，而是需要创造的。就是说，即便发现了传统文化中现实的“价值对象性”，也还需要根据现实之“原”对之进行价值“再创造”，从而改造和进一步发展传统文化。这样才能实现“原”“源”整合，实现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统一，创造出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征的新的文化体，实现民族“精神命脉”的延续。这是文化演进中某种新的社会文化建构成因的一般路径。无论是历史上每一个时代的文化的生成，还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生成，都有“源”与“原”两个方面的综合成因。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的产生、演变和发展，就是“源”与“原”辩证运动的过程。先秦儒家文化的产生，正是本“原”于春秋战国时期现实的社会变革和孔子、孟子等自身的社会角色及其价值取向，对“源”于西周以来的“有孝有德”、“敬德保民”和关于“礼”、“仁”等传统伦理及其精神的“因”“革”。西汉董仲舒推阴阳之变，究“天人之际”，发“《春秋》之义”，举“三纲”之道，给“孔子之术”以新的理论形态和思想内容，从而创立了汉代“新儒学”，其本“原”归于西汉“大一统”的封建秩序，而先秦的原生儒学和诸子思想则是建构其思想体系的文化资源或思想渊源。董仲舒的贡献，就在于根据巩固封建“大一统”秩序的需要，确认“孔子之术”的现实价值对象性，进而对之进行“价值再创造”使之成为“定于一尊”的封建统治思想。至于宋明理学及其伦理思想体系的产生，同样有着“原”、“源”两个方面的成因。所谓“心性之学”，固然有儒、佛、道的思想渊源，但其本“原”还是在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以及复杂的社会心态。而所以有“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异，则是各自基于对所处社会现状的不同思考而对传统儒学和佛、道“文本”所作的不同诠释、筛选和整合。尽管

儒家文化其“形”发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改变，但都通过其“形”而保存和延续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把对社会文化建构成因或社会文化演进的“原源之辨”这一规律性认识，用来反思儒学在近代的命运，可以发现在对待传统儒家文化上的种种偏向：无论是“文化激进主义”对传统儒学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一唯褒扬，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还是“文化保守主义”对传统文化所持的“复古”立场，在对待“原源之辨”上各自陷入了片面性。前者否认传统文化作为“源”的价值，后者无视或不能正确把握正处于变革中的“原”，因而也就不可能科学地对待“源”及其与“原”的关系，从而损害了民族“精神命脉”的延续和发展。所以马克思主义既批评“文化激进主义”，又反对“文化保守主义”。这里的问题要害就是如何正确地把握社会文化建构的“原源之辨”。对此，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但是它又“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这是对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关于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问题上的方法论总结，反映了“新文化”成因的“原源之辨”的一般规律。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复杂的历史条件，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和实际操作中，原先的那种“全盘否定”的思维方式以新的形式重新出现，在“文革”期间发展到了极点，再一次对传统文化这个“源”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批判与否定。而“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的理论又强化了这种“左”的思维方式，严重地背离了社会文化建构成因的“源原

之辨”，几乎造成了优良的传统文化的“断层”，几乎割断了民族的“精神命脉”，大伤了民族的“元气”。在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文化中走了弯路。“文革”以后，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也逐渐走上了正确的轨道，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绩是显著的。但也还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偏向和问题。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中又一度出现了“全盘西化”的思潮，主张以“西方异质文化为参照系”来检验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早就应该放进历史博物馆了。从右的方面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同时，活跃于海外的“现代新儒学”开始传入并加入了“文化热”，由于它严重脱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个“原”，显然不能作为研究传统文化的指导。尽管这样，也多少影响了一部分学者的研究思路，有的甚至提出“恢复其（指儒学）历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大陆代表中华民族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并以此为宗旨发展成为一种“儒化”的思潮。其中有人就提出“儒化社会主义”的思想纲领，陷入一种更为极端的“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这两种思潮在方法论上的错误也都是这样或那样背离了社会文化建构的“原源之辨”。无助于甚至损害了民族“精神命脉”的延续和发扬。

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传统儒学这样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科学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他说：“我们要善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发展现实文化有机统一起来，紧密结合起来，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进而又说：“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受到当时人们的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因而也不可避免会存在